

宋学研究集刊

SONGXUE YANJIU JIKAN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编 [第一辑]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编

宋学研究集刊

[第二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学研究集刊. 第2辑 /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308-07738-5

I. ①宋… II. ①浙…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
宋代—丛刊 IV. ①K244.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247 号

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王 晴

封面设计 联合视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568 千字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738-5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北宋的中国观

- 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 王明荪(1)
-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范立舟(39)
- 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 程民生(56)
- 略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周方高(86)
- 论张载的“气质之性”及其谱系的开展
 - 由分解与圆融二义为诠释进路 王俊彦(96)
- 从“春秋学”转入“易学”
 - 北宋“金陵王学”(1021—1067)的“天学”构造
 - 杨天保(131)
- 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生的“违志开道” 陆敏珍(148)
- 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 何忠礼(163)
- 论北宋皇后的丧礼 韩桂华(177)
- 唐宋变革期的一个面向
 - 从“律合格式”到“敕令格式” 桂齐逊(207)
- 再论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 张希清(258)
- 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
 - 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之考察
 - 曹家齐(276)
- 两个同财共居大家族的演变历程
 - 宋代司马光家族与姚氏家族研究 李裕民(298)
- 宋代禅宗僧人的行脚及其困境 蒋义斌(308)
- 论盟誓背景下北宋对辽策略的恐惧心理 安国楼(329)
- 北宋陕西路气候变迁 江天健(339)
- 论妈祖信仰在宋代的嬗变及其成因 李小红(366)

2 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从吃大蒜到吃辣椒

——宋代以来四川的人群变迁与主要辛味调料的改变

..... 吴松弟(388)

沈括与医药学 杨渭生(397)

南宋状元策试析 宁慧如(402)

苏学嫡传苏伯衡

——兼论蜀学对浙学之影响 周扬波(429)

略论北宋尚意书风对明代书家之影响 赵太顺(460)

宋中兴高孝光宁四朝实录修纂考 王德毅(494)

南宋社会文化学家王应麟仕履系年考释 龚延明(509)

南宋“制造御前军器所”与“御前军器所”考辨 史继刚(525)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 张其凡(529)

宋代家族史研究述评 粟品孝(565)

后 记 何 俊(585)

北宋的中国观

——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 王明荪

一 前 言

“中国”的词称起源甚久，其概念的应用始于商代卜辞的“中商”，即殷商时已有“中国”意义的称谓。^① 商代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常与方位、方国相对而称。^② 在先秦古籍中，“中国”词称的总数甚多，其所含的意旨约略有五种，而以指称为诸夏的领域为范围者最多，五种意旨的基本意义，都指出了确定的领域，即说明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词称的共喻定义已非常明确，主要的表示是同族类的性质及同文化的教养。自秦汉以后，两千年朝代更替，各以朝代为国名（号），但“中国”之自号称呼至近代仍未放弃。^③ 笔者于多年前讨论夷夏观时，也曾约略论及“中国”的称谓及其意旨，但未多细论。^④

① 参见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台北：大通书局 1972 年，第 386、387 页。

② 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台北：大通书局 1971 年，第 319 至 321 页。

③ 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稿》，台北：自印本，1977 年，第 441 至 480 页。文中以先秦五十三种载籍考察“中国”词称总数为 178 次，究其意旨约有五种，其一谓京师之意，其二谓国境之内，其三谓诸夏之领域，其四谓中等之国，其五谓中央之国。

④ 参见拙作《论上古的夷夏观》，收在《中国民族与北疆史论——汉晋篇》，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 1987 年，第 19 至 67 页。

历史上在统一的时期里,虽然多以朝代名来指称,但用“中国”词语来指称本朝也应无问题,传统上以大一统就自居为正统,自然也就代表了中国,称本朝的朝代名(国号)或称中国都无问题,二者间是极其自然的等号。但若在分裂而非一统的时期,各国并立而有其领域、人民,政权既不相统属,建国立业也有其理据,即便是有强弱大小或臣属关系,仍是各据其地,各称其国(朝),则“中国”词称的应用及所指与一统时期是否相同?其间的异同与分歧情形如何?透过这些观察可以看出当时对“中国”的一定观念,而又可以借这种观念来认识其时对于本国与他国的一些看法。

在10世纪初大唐帝国瓦解后,除去中原地区有五代的遽递,南方也前后分立为十国的局面,这已是南、北的大分裂,而北方又有契丹的辽国,进而且获取燕云之地。到10世纪中期稍后,五代结束于赵宋之立国,进而南下攻略统一中国,但西方仍有夏国割据的西朝,以及北方辽国的北朝,宋则成为与二国对峙的南朝;而辽、夏所据之地,在唐代是属于中国领地或羁縻州郡。以时局南北来看,大略是第二次南北朝之局,若加上西夏,则又是第二次三国时期。到12世纪30年代,女真族兴起灭辽,建立金朝为国,进而南下灭北宋,至于划淮河为界与南宋对峙;西夏同时仍有其国,是以仍是延续了第二次南北朝或三国之局未变。宋朝前后与辽、金为南北分立,加上西夏为三国,在此段大分裂的中国历史上,宋人的“中国”观念,关系着对本国(朝)的定位,同样地,辽、金、夏三国亦复如此,而宋人的“中国”观,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对他国的态度,相对地,其他三国也应该对宋朝的态度有所影响。近古时期时间颇长,情形也较复杂,因此,本文先行讨论北宋时期与南方分立各国及辽、夏间的中国观,同时也将宋人使用“中国”词称的范围加以整理、讨论。

二 北宋与分裂各国的“中国”词称

宋初政权取自五代,中国政局仍为五代时分裂的各国形势,赵宋以后周的基础,经两朝的征战逐渐攻取各国而完成统一。五代各朝以前后相继于唐朝,都以正统自居而称其本朝或中国,宋既承后周朝而立国,也

不例外延续这中国之号。宋太宗曾说：“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①，以唐末五代时为分裂的中国，这与仁宗时鱼周询所说相似，他说：“臣以谓唐季及五代，疆臣专地，中国所制，疆域非广。”^②唐末五代的分裂局势，到宋初建国仍然如此，故而仁宗时吕景初的奏疏中曾说到：“当祖宗时，四方割据，中国才百余州”，此又与苏辙所言，宋初创业时“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相同。欧阳修也是以宋初创业时说“中国地狭”。^③当时的中国就成为继五代以来的宋朝，因宋初尚未完成统一，故只有五代时所领有的百余州之地，自是中国地狭了。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李元昊攻宋，刘平任边事，在所献攻守之策中说：“五代之末，中国多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又说：“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等，^④前句话说的中国是指五代时的后周，后句话的中国则是指宋朝本国。这些例子说明了宋人在言及五代及宋朝时，都是指称为中国的代表。

宋初对分裂的各国，在指称“中国”时不异于五代，太祖乾德二年(964)于江北置折博务，禁止商旅过江，“诏谕(南)唐主，恐其挟中国之势，有所侵扰也”，^⑤是以宋为中国，对南唐又自称“中朝”、“大朝”，称南唐为“江左”、“江南”。^⑥五代后周时，南唐李璟遣韩熙载往后周朝廷，归来后李璟“问中国大臣”，韩熙载推崇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⑦南唐称五代为中国，到宋太祖建国，南唐李煜亦复如此，在劝南汉刘鋹对宋称

① 见《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七》，北京：中华书局版，第14134页。

② 见《宋史》卷三二〇《鱼周询传》，第10011页。

③ 见《宋史》卷三二〇《吕景初传》，第10020页。苏辙所言，见《苏辙集》，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卷二一《上皇帝书》，第294页。欧阳修所言，见《长编》卷一三六，仁宗庆历二年，第3252页。

④ 见《宋史》卷三二五《刘平传》，第10501页。

⑤ 参见《长编》卷五，太祖乾德二年，第130页，诏书见于《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五《谕江南李煜不令客旅过江于江北置务折博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72页。

⑥ 参见《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五《答江南李煜手表》、《谕江南李煜延纳泉州陈洪进诏》、《赐江南李煜嗣位礼物诏》，第871页。

⑦ 参见《宋史》卷四七八《南唐李氏》，第13867页。

臣的书信中,李煜称宋为“大朝”,又称宋是“光宅中夏”、“承五运而乃当正统”、“中国”等^①,明显以宋为正统、中国之所在。南唐大臣也以宋为中国,张洎、张洎当南唐国亡,“俱仕中国”,即仕于宋朝,而张洎原本与陈乔相约于国亡时殉国,但其后陈乔死,张洎不死,对国主李煜说:“若俱死,中国责陛下久不归命之罪,谁为陛下辩之,臣请从陛下入朝”;^②张洎不死,而后出仕于所说的“中国”宋朝。

据宋人史书的记载,宋与分裂各国对“中国”的语境与五代时相同。北汉的刘继业(杨业)劝其国主拒契丹而通好于宋,并“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如此可免战乱而生灵涂炭,但北汉国主不从。^③在记宋与北汉间的沟通时,说宋遣谍者语于北汉国主,汉、宋二国无仇,汉应附于宋朝,汉“若有志于中国”,就应南下太行山以决胜负,北汉主回报称:“河东土地兵甲,不足当中国之十一”,守土是维持刘汉的宗庙之故,^④这种记载是以宋代表中国,又以中原为中国的代表。

前文曾说到南唐李煜给南汉国主刘鋹的劝降书信,以宋为中国,在此前南汉国内有大臣劝刘鋹若不整饬兵备,即须通好于宋,说:“(南)汉承唐乱,居此五十余年,幸中国多故,干戈不止”,主要是指中原五代各朝的“多故”,因之南汉得以偏安;又说天下乱久必治,以宋太祖为“真主”已出,势必一统天下。南汉国主刘鋹未能听从通好的意见。^⑤对于其他唐末五代以来的地方各国,虽不能逐个看到“中国”的书写应用,但仍在一些诏书中见到宋朝承五代以来的“中原”、“华风”、“王土”、“皇风”等词

① 参见《宋史》卷四八一《南汉刘氏》,第13921至13925页。

② 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页。张洎与陈乔事又见于《宋太宗实录》卷八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但所载并未书写出“中国”词称,可参看。

③ 参见《长编》卷一〇,太祖开宝二年,第228页。

④ 参见《长编》卷九,太祖开宝元年,第205页。李焘所记又参引《十国记年》、《五代史》,文辞略有不同。《旧五代史》未记此段言语,《新五代史》所记相同,见卷七〇《东汉世家第十》,第869页,此当为李焘所本。《宋史》所载亦同,见卷四八二《世家五》,第13936页。

⑤ 参见《长编》卷五,太祖乾德二年,第132页。

语,以继正统自居,即是以“中国”自居。^①

仁宗时依智高为乱于广西之地,“诱聚中国亡命”,后俘获宋将亓贇,“因问中国虚实”,亓贇陈说大略,欲说服依智高内属于宋朝,然而宋朝廷以智高役属于交趾,唯恐生事,问计策于广西转运使萧固,萧固主张安抚,以“今中国势未可以有事于蛮夷”之故。^② 这里指称的“中国”都是指宋朝而言。依智高攻取得邕州后,建国号大商国,称仁惠皇帝,改年启历,制度上是“皆称中国官名”^③,即仿宋朝官制名称。除去如依智高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政权外,同样是在云南一带的大理国也如此,据史载依智高兵败后逃入大理国,史称“南诏久,中国绝”^④,此处说的“中国”是指唐以来的中国,亦即神宗时所言“唐六诏为中国患”^⑤,所指相同。故而在宋朝廷的诏书里,将大理与辽、金、夏等同看为“四裔”之国,在宋人眼光里,对四裔各“外国”而言,自然宋朝是中国。^⑥ 这些在下面的整理与论述中还有具体的例证。

① 参见《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五至二二七,第869至880页。宋对中国内分立各国的文书用词形式与对外国有不同,大体上是依唐朝为范例,有代表中国正统的中央朝廷之意,可参看 Wang Gungwu,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China among Equals*. (Univ. California, 1983. PP. 47~65).

② 参见《长编》卷一七〇,仁宗皇祐三年,第4078页,又注言“萧固云云,具王安石墓志增入”,萧固所说,见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五六《尚书祠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萧君墓志铭》,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第75页。另参见《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第14215页。

③ 参见《长编》卷一七二,仁宗皇祐四年,第4143页。

④ 参见《长编》卷一八〇,仁宗至和三年,第4355页。李焘所记以据《萧注传》言依智高为大理所杀,又以与智高本传不合,而司马光《百官表》、《大事记》亦言智高死于大理,故可待考。按《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所载是依智高为大理所杀,并“函首归献”于宋朝,见第10733页,此与《宋史·蛮夷三》载依智高“其存亡莫可知也”不合。见第14218页。

⑤ 见《宋史》卷三三三《潘凤传》,第10718页。

⑥ 《宋大诏令集》为宋绶后人于绍兴年间编纂,南宋时曾有刻本,但今所见皆传抄本,见《校点说明》,第2页。集中编刊为四裔各有金、契丹(辽)、西夏、高丽、交趾、大理、西蕃(唃廝囉、邈川等)、诸蕃(秦州、沙州、安定、潘罗支、甘州、于阗、溪洞蛮等)。

三 北宋使用“中国”词称的范围

宋人遗留的文献资料甚多,使用“中国”的词称也极多,在各方面的论述中常可看到,在使用范围上也颇为广泛,大略可以整理出下列各种范围。

(一)地理天文

太宗端拱二年(987),因彗星出现,宰相赵普上疏中说道:“臣闻五星二十八宿,至于五岳四渎,皆居中国,不在四夷。”仁宗时,司天监言:“五星皆在东方,主中国大安。”御史李京曾因地震而说“西北(辽、夏)二敌有窥中国之意乎!”似乎自然灾害也能感应人世现象,而宋朝应加警惕。哲宗时因彗星出现,羌人收兵停战,哲宗说:“羌人犹畏天变,况中国乎!”这里所说中国不只是指宋朝代表的中国,也是指传统以来华夏所居之地。^① 神宗熙宁七年(1074)沈括上《浑仪议》,对于旧说“中国于地为东南”提出反驳,其中屡次说到“中国”,所指称的是地理上的中国,也是传统华夏所居之地。他在谈论土族种姓时,说“后(北)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②,所说的中国仍是指华夏生聚的地理概念。地理上所指在史书中也大可见到,如说:“初,麟府西南接银川,西北接夏州,皆中国地也”^③,是指在宋前唐朝五代之时,这些地区原都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而后渐为党项的夏政权所侵占。另外在说到自然的地理上往往也以华夏所居的中国为一定的地理方位,如论黄河时最为常见,由于当时宋人所论除去河患本身问题外,又多集中于国防形势因素的考虑,故在此暂略,留作下节讨论。神宗时曾遣官往沿边封土掘壕,派往鄜延路的范育有所

① 太宗事参见《长编》卷三〇,第685页。仁宗事参见卷一四五,仁宗庆历三年,第3512页,李京所言,见庆历五年,第3766页。哲宗所言参见卷四九二,哲宗绍圣四年,第11685页。

② 沈括《浑仪议》事,参见《宋史》卷四八《天文一》,第956、957页。氏族种姓说,参见《梦溪笔谈》卷二四,元刊本,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第17、18页。

③ 见《长编》卷一八五,仁宗嘉祐二年,第4469页。

意见。他说累年的兴兵“非中国之不欲平也”，指的是宋朝本国，又说“穷边生地非中国之土”，同样指本国的地理所限范围，又引《周礼》说封沟在本国之土而不行于夷狄之邦，王安石则反驳说立封沟乃在国内的延州而非在西夏境，并不违《周礼》之意；又说：“中国是腹里，却立封沟，与夷狄接境，乃不立封沟，此何理？”^①双方所言说的地理，即用中国代表着宋朝国境。

(二) 局势政局

在论及全面一般的局势或国家政局时，宋人常用概括的说法来指其本国，或者传统华夏汉族的朝代。太宗时言及征战用兵，宰相吕蒙正提出简易清静治国之道，以为“中国安静，四夷自归”。中国局势的安稳镇静，为四夷归顺的先决条件，类似于英宗时范纯仁所说“亦使中国四夷知陛下克己奉天，尊礼化民之意”^②。神宗时论到西夏边事，宰相王安石正致力于变法，不想旁生枝节，说道：“旦令柴世宗有如此晏安之中国，当西夏数州之地、数岁之孤儿，不知还能扫除得否？”^③神宗时已是宋朝中期，当时局势可说晏安稳定，较之后周世宗时条件优越得多。所称中国既指宋朝而言，也指华夏民族或汉化的中原朝廷所有之国。类似所指称例子颇多，如邓綰对神宗说：“且以陛下英睿之略，中国全盛之势”，王安石说“今中国地广民众”，以及说西夏“若中国形势强，附中国为利”等，徽宗时下诏说：“辽与夏人合纵，恐动中国”等。直到钦宗时，金兵灭辽，钦宗给辽国将领耶律伊都（余睹）的国书中，仍自称为“中国”来论述当时的

① 参见《长编》卷二二八，神宗熙宁四年，第5547至5551页。

② 参见《长编》卷三四，太宗淳化四年，第758、759页。李焘自注，以为吕蒙正所言，所据为其本传，然《宋史》吕蒙正传未见此言，李焘所见或为国史原传所载。范纯仁所说，参见卷二〇六，英宗治平二年，第5008页。

③ 参见《长编》卷二一四，神宗熙宁三年，第5217页。

局势。^① 所说中国的局势状况等都是指宋朝而言;虽然是论局势而与下文所说的国家往往又是一致的。

(三)国家

哲宗元祐元年(1086)左司谏王岩叟上疏,谈论天下的大害,在于“兰会之坐敝中国”,指临西夏边地的兰会路,因频年战祸,恐生心腹之患,宜与西夏结和,否则“后日兵连祸结,中国厌苦”,耗伤人民财命,“陛下须念此皆中原生灵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据之以划边徼者也”。王岩叟指称的中国即是宋朝国家,中原是指内地,以别于边区。当时朝廷正讨论与西夏的疆界事宜,同知枢密院范纯仁提出三策,言及“中国旧寨”、“中国谦帛”、“夷夏”、“华夷”等,指出中国即宋朝国家的称号,而“华夏”也就是宋朝中国之人;后来哲宗给西夏的诏书中也写到“除元系中国及西蕃旧地外”,可以看出地理上宋朝之地就是中国之地。在此前神宗末年,西夏就提出议和,要求边境为宋所攻占的土地,于是有宋人在朝廷的议论,同知枢密院安燾、右仆射吕公著与范纯仁都同样主张宋朝所攻取之地,本就是有“中国”故地、旧境、旧寨,不宜割让给西夏,这里的中国代表宋朝国家的领域。^② 神宗时有蕃部人入界刺探边事的处置请示,神宗批答须严加处置,说是“入中国刺事”,表示宋国国家的意思甚为明白。^③ 在宋人眼光中以朝代即是国家而来称呼中国的例子颇多,如欧阳修说“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就是中国在隋唐时期的情形,也可以说隋朝时的中国及唐朝时的中国与突厥、吐蕃的相互胜败。到宋朝时就会说

① 参见《长编》卷二五〇,神宗熙宁七年,第6096页。卷二三二,神宗熙宁五年,第5628页。王安石说西夏见《宋史》卷一九一《兵志五》,第4758页。徽宗下诏,政和六年(1116),见《宋会要辑稿》第八册《蕃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页下。钦宗国书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页。

② 参见《长编》卷三八二,哲宗元祐元年,第9306至9313页。哲宗诏书,见第9496页。

③ 参见《长编》卷二九七,神宗元丰二年,第7218页。

“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故欲侮玩中国而已”，都是以宋朝国家为中国。^①余靖在西夏李元昊的国书中自称“吾祖”也与欧阳修一样，斥之为侮玩，又说灵、盐等州“皆朝廷旧地，若办封域，犹当归之国家”^②，所说的国家就是宋朝本国。仁宗时范仲淹知延州，他上书谈论对西夏之策，提到“使其不僭中国之号而修时贡之礼，亦可俯从”，当时李元昊有称帝的打算，称帝是国家之号，为中国的宋朝所有，西夏为藩国，先世受宋册封，所以不能僭用中国之号而只能称王。不久，元昊遣人与仲淹面见，仲淹写书谕交覆元昊，无非是劝他称藩受宋册封如故，双方和平相处之意，书中说西夏“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又称李元昊为“大王”，称西夏为“大王之国”，但对元昊称帝，欲效契丹国的“独立”，则说“北朝称帝，其来久矣，与国家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方也”，指出契丹在宋前五代时即已立国称帝，与宋朝国家已是兄弟二国关系，与西夏受宋朝封藩之国不能相比，同时说“唐诸蕃所建官名，未尝与中国相杂”，以唐朝为例范，藩国有其制度官称，不曾与中国杂同，言下所指即是唐、宋都是中国的国家称号。^③

苏洵在论说中国时，说“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并以内为本，外为末。这样的说法有如先秦内外夏夷的服制观念。说到西夏是“出不逊之语，以憾中国”，贪求贿赂“视中国如外府”，说到契丹是“驰一介入中国”，以形式凌邀得金钱财物，“中国损数百千万”、“中国日以贫”等，造成中国竭尽民力供其所欲，在文中屡用匈奴来指辽国，而多用中国来指宋朝本国。以中国内、四夷外的说法，原出于《春秋公羊传》以及周代的服制而来，北宋末的安尧臣也持同样论调，而且还说：“盖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服，无道未必不来”，这又似欧阳修所说的话及其观点，而所说

① 参见《长编》卷一三六，仁宗康定元年，第3065页，卷一三六，仁宗庆历二年，第3257页，卷一四二，庆历三年，第3410页。

② 参见《长编》卷一四二，仁宗庆历三年，第3409页。

③ 参见《长编》卷一三〇，仁宗庆历元年，第3080、3085至3089页。

的“中国”就不限于特定的一朝,是泛指传统的华夏汉族各朝。^①苏轼在论策略时,说到宋朝并无的水旱盗贼、乱臣割据、权臣专制、四夷交侵等严重问题,但“中国皇帝常有外忧”,就是指宋朝本身国家的皇帝。当时虽不至四夷交侵,但辽、夏二国对宋朝国家的压力极大,这是苏轼所说“常有外忧”的原因。苏轼又说“夷狄抗衡,本非中国大患”,只要委任责成当无问题,如此“则中国固吾之中国,而有所不可为哉”,这里说明了中国范围是宋朝国家的范围,与辽、夏夷狄不涉。在论训兵旅之策中提到辽、夏“以区区之二虏,举数州之众,以临中国”,北方、西方的辽、夏二国,抗衡宋朝的中国。苏轼在其他策略的论述中,不断地用二虏、西戎北胡等名称指称辽、夏二国,说到宋前的朝代时或用中国为当时的国家称谓,又有相关的如“中国之法”、“中国之美”等,对于宋朝本国几乎都用中国来论述,也用了相关的“中国之人”、“中国士大夫”、“中国之象”、“华人之象”、“中国之长”等词称,一方面是用以代替宋朝的国家称谓,一方面也显现了传统的夷夏观念,“中国”在他的论述中,时时延伸出来以前历代华夏或汉族皇朝的整体概念,在他的观念里宋朝及以前汉族的朝代,国家的称号就是中国,尤其在相对于外国(族)时更是如此,于是“中国”就成为国家与民族及其文物制度的综合体,正如他说:“胡人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②

司马光在英宗时论及冗兵问题,他说:“自景德以来,中国既以金帛绥怀外服,不事征讨,至今六十余年”,是指真宗景德年与契丹订定的澶渊之盟,到英宗时已有六十多年之久,盟约中的岁币是国家的给付,视契丹为上古服制中的外服夷狄。在论边区守臣生事时,司马光说:“窃见国家所以御敌之道,似未尽其宜”,敌国的顺逆都缺对应的处置,故而“是使

① 参见苏洵《苏洵集》卷一《审敌》,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5至9页。安尧臣所说,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集,《政宣上帙二》,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第12、13页。欧阳修所言,见《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5页。又夷夏内外说参见拙作《论上古的夷夏观》,第28至31页。

② 参见苏轼《苏轼集》(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应诏集》卷一《策论第三》,第729页。卷四《策别二十》,第751页。卷五《策断二十五》,第758、759页。

敌人益有轻中国之心”。当西夏遣使来贺正旦、贺寿圣节时,表现出的是称臣入贡的情形,司马光却要朝廷留意,说西夏“招诱中国不逞之人及熟户蕃部”、“怨愤中国”、“采访中国虚实”、“欲使中国之兵疲于奔命”、“何敌人为谋之深,而中国虑事之浅也”。若将这些“中国”词称改成“本国”则所说完全一样。其他如在熙宁七年(1074)上疏“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批评神宗熙宁年间对西夏用兵之失,主张“先阜安中国,然后征伐四夷”,都是指宋朝本国而言。“休息中国,华夷之人,孰不归戴”,这是元丰八年(1085)对新法新政的意见,仍如熙宁年间的态度一样,因反对开边拓土的对夏战争而说。到哲宗初继位时,司马光明白地说出“凡边境安则中国安,此乃国家安危之机,……可使华夷两安,为利甚大”。宋朝为“中国”的国家,华、夷为二国的分别。但司马光也有将“中国”延伸为华夏皇朝的代称,他在熙宁七年上疏中曾用了“汉武帝征伐四夷,中国虚耗,贼盗群起”等话语,中国当时的国家即是汉朝,这与北宋末太宰郑居中说汉朝的岁币时,言“且前古帝王岂忍以中国之富,填于卢山之壑,委于狼望之北哉”,同指出中国即是汉朝。^① 而与前文苏轼的指称历史各朝时也并无不同。

再举韩琦所说为例,他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任陕西四路经略招讨使时上奏疏论对辽、夏策略,说“契丹闻国家深长之谋,必惧而保盟,不复轻动,然后中国有太平之期矣”,契丹调停宋朝与西夏战事,若使契丹出面调停成功,“则此寇要功,下视中国”,若拒绝之,或恐契丹“称兵塞外,强势胁我国家”。^② 韩琦与许多宋人一样,在内称契丹为寇贼之类,而所称的中国也如其他宋人所指同为宋朝的国家称呼。

① 司马光所论说,参见《长编》卷二〇四,英宗治平二年,第4941页,卷二〇五,第4969页,卷二〇六,第5008至5010页,卷二五二,神宗熙宁七年,第6164至6167页,卷三五五,神宗元丰八年,第8496页,卷三七四,哲宗元祐元年,第9064页。郑居中所言,参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集,《政宣上帙一》,第5页。

② 参见韩琦《韩魏公集》卷一二《家传》,丛书集成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82至185页。

(四)外族、外国

宋人言及国家及其本朝、本国时如上所述,其中不少也相对于言及外国时并称,虽然资料颇多可作举证,但实无法尽举。这里再就举称外国或外族时,所使用“中国”的词称来说明,唯不以辽、夏二国在内,下节中再讨论这两国。在真宗时唃廝囉愿攻西夏以自效,朝廷论及此事,真宗说:“王嗣宗(曾任枢密副使)亦言外国相残,中国之利也,朕思之,何必幸其相伐。”真宗引王嗣宗所言的“外国相残”,如同英宗时延州守臣程戡所说:“所谓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当时是西夏李谅祚时期,国内有酋豪反叛,要求宋朝出兵援助,程戡认为是攻取西夏的良机,故有这种看法;后来因英宗身体不适,朝臣怕生事而止。^①宋朝为中国,宋朝之外的外族与外国都在相提并论时就用“中国”来称本国。在前面曾举出欧阳修以隋、唐时与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是相同的说法及观念。神宗时因西夏点集兵马但却未对宋朝发动攻势,宣抚使以为西夏或往西蕃发兵,神宗问王安石,安石也说西夏或先攻伐西蕃,其后“乃来与中国争”,又在论到西北地区的羌人时,称“今生羌久与中国隔绝,……皆非中国所知”^②,这都是论及外国、外族时,指中国就是宋朝的说法。沈括记羌人(青堂羌)为吐蕃别族,唐末时蕃将尚恐热作乱,“率众归中国”,又说唃廝囉为佛男之意,“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③,前所说的“中国”是唐朝的代表,其次说的“中国”如同说华夏汉族之意,也可以是指传统的中国各朝。宋朝对西蕃羌人的诏制中同时反映了这种看法,“王者之抚殊方,盖用威怀之道;侯藩之卫中国,类如信顺之心”,“抚有一方,翼戴中国”^④,宋朝视西蕃羌族地方领袖为外藩,仍以藩国的服制看待,而中央宗主之国即宋朝所代表的中国。

① 参见《长编》卷八五,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第1950页。

② 参见《长编》卷二二〇,神宗熙宁四年,第5350页。程戡所言,参见卷二〇七,英宗治平三年,第5021页。卷二三〇,神宗熙宁五年,第5598页。

③ 参见《梦溪笔谈》卷二五,第31、32页。

④ 见《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九《西蕃邈川首领董毡移镇西平节度制》,第937页。《董毡加恩制》,第938页。